

Lt:Ric

高度赞赏翁俊民博士复办泗水“中中”华校

巴厘：意如香

“宁可穷家业，不可穷教育”，是历代先贤办学的崇高理念。注重教育培养人才，是先贤们倾毕生精力从事的“利人利己”伟业。一个企业与国家的发展壮大，全靠拥有大批志尚崇高的尖端人才，而尖端人才更是通过长期的教育育人，培育有信仰理想的人才而获得。古训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因此崇尚教育，培育人才，是历代先贤留给后人最为宝贵“治学、齐家、立国”的至理名言。

在南洋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老先生，陈老先生是个著名的星马华商与爱国侨领，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他四处奔走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斗争，曾到过延安拜会毛泽东与周恩来，对

中共的信仰理念与坚决抗日推崇备至，也曾经被日寇追捕而隐蔽在东瓜玛朗避难。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后，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惜变卖星马的家产而在福建创办“厦门大学”与“集美中小学”。陈嘉庚散尽家业仅为新中国培养人才，一身致力于教育的高风亮节，在中外赢得极为崇高的评价。如今厦大与集美中小学，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极富盛名的高校。陈嘉庚老先生的善举与美名，更是与这两所学校教育育人的伟业，永远载入新中国教育史里名垂千史的海外伟人名列中。

如今我们又在印度尼西亚，见证了一个“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成功企业家翁俊民博士。翁博士一向处事待人坦荡有为，事业成功后，对公益事业出手不凡，获得当局器重，被委任为总统与军部顾问高参。难能可贵的是，他读泗水华校

“中中”只到初三的“最后一课”，学校就被苏哈托军政权封闭了。但翁博士仍然对中华文化情有独钟，没有忘记“中中”学校的师生情。在他事业成功鼎盛期的当今，始终缅怀“中中”陈金运老师，不辜负对他复办学校的嘱托，翁俊民博士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地独力办起了复办“中中”华校的重任。

经过几年的筹划，一所宏伟的泗水“新中中”华校即将封顶，明年3月将完成全部工程项目，6月份就能招生开课。前泗水“中中”有学生2900名，教师130名，是泗水一所与“新中”齐名的名校，培养了无数的泗水华社人才，成为当今泗水华社的中坚人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社会栋梁职责。在香港与中国大陆，“中中”学子也是人才辈出，都发挥了“中中”人的社会责任。

翁俊民博士下决心要把“新中中”办成继承先辈培养

人才的名校，他提出了宏伟的办学理念，重视教师队伍的高品质高质量，正在物色顶尖人才掌校的校长人选，并积极与新加坡、中国的教育机构合作，和欧美的高等名校挂钩，要把“新中中”办成真正的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翁俊民博士认为：不能穷教育，更不能穷教师，聘请德才兼备的好教师，必须注重教师的福利，教师生活有保障才能专心从事教育生涯。他认为：不是有钱就能建校，要有崇高的办学理念，才能办成有灵魂的高等学府。因此不能只注重学校赚钱、只讲“利润盈利”，如果一味只是广收学员，“高学费，高收入”，最终只会办成“学店”的商业模式，脱离了学校培养人才的灵魂宗旨。如此大的“学店”误人子弟，贻笑大方，不办也罢。

翁俊民博士也认为：要

如母校“中中”那样，严谨治学，培养出有用人才。因此必须面对电子、高科技人工智能的现代化时代，接受这种挑战，要把20年后的社会变化预计在内，建成为“新中中”的强势，努力办成高质量的印尼数一数二中小学。

众所周知，熟读领会了中华古文化内涵的翁俊民博士，向来敢说敢言，言必行，行必果，他感谢广大“中中”母校校友的支持，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立志复办“中中”华校，给“中中”师生一个交代，也对华族下一代一个交代，给华裔子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他信誓旦旦：让华族子弟上“最后一课”华文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深信：以翁俊民博士的为人魄力，与翁氏家族企业的蒸蒸日上，必能在财力兼备下，广招人才，为服务“新中中”学校，培育广用尖

端良才。在翁博士高瞻远瞩的治理下，必能把“新中中”办成一所印尼名副其实的高质量华校，继承“中中”母校老前辈崇高的办学理念，高举陈嘉庚办学育人的高风亮节，办成成为像“厦门大学”一样，为海外华人推崇求学的高等学府，则是印尼华裔子弟之福音。誓为印度尼西亚祖国培养高端人才，诚如翁俊民博士所表达心愿：让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为建设印尼祖国，贡献华族的聪明才智。正是为实现翁俊民博士创办“新中中”的崇高理想，服务于印度尼西亚祖国的宿愿而开怀高唱。

祝愿翁俊民博士心想事成，让“新中中”与“新中三语学校”一样，办成成为KaliMas滔滔金河畔泗水之滨的著名学府，成为泗水之光，让泗水华人与“中中”人扬眉吐气、成为永远的骄傲。

椰風星雨

本报评论员：余凡

随着各国的情报解密、信息泄露，历史的刀光血影、巨浪淘沙，很多丑恶的黑幕被掀起，结疤的旧伤被揭开。让世人看清了那些民主灯塔、自由之神狰狞及沾血的真面目。

《罗盘网》(KOMPAS.com)于25日报道，因观察家(Observer)的报告，不少外国媒体争相关注英国政府牵涉到印尼1965-1966年大屠杀事件的秘密。该事件是因为1965年发生的俗称“九卅事件”(G30S)流产政变后引起的，印共领导层被追捕、刑拘甚至处决！

1965年11月22日，印共党魁及高层陆续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屠杀行动并没有停下。创办于1821年的英国主流媒体《卫报》(The Guardian)近日称：英国被证实煽动印尼1965-1966年的大屠杀事件，而美国中情局CIA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那次事件是“20世纪最残暴的集体大屠杀事件之一”，估计被杀害的左翼或无辜人士达50

英国秘密煽动1965年大屠杀

万人之多。

《卫报》17日援引最新解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称，在当时西方同盟与苏联阵营“冷战”的大背景下，为防止印尼投向共产主义阵营，英国外交部秘密机构讯息调查部(IRI)官员威恩于1965年初被派往新加坡，带领一个秘密团队打着“印尼爱国人士”旗号编写反共、反苏加诺政府的虚假信息，并专门针对印尼军方和各级官员展开宣传攻势。

1965年9月30日，一名左倾的总统警卫团校级军官，竟意味地发动军变，杀害数位将领。英国情报部门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马上把事件归罪给印共及华共团体，开动宣传工具并印发大量刊物，煽动右翼将领及反共团体“把印共及所有左翼团体消灭干净”！还警告“只要印共领导人仍逍遥法外，他们的从属没有受到惩罚”，印尼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

《卫报》指出，虽然外界认为印共部分成员参与“九卅运动”，并无证据表明苏加诺总统事先知情，亦无证据表明印共作为一个组织

策划了此事。然而，苏哈托仍借机剥夺苏加诺的权力并将他软禁。更以军权霸凌手段排除异己，大肆没收华侨团体的合法资产。

报道提到一名叫做北佐(Bedjo Untung)的印尼老人，当他17岁时参与苏加诺路线的“反对帝国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他父亲是中爪哇有威望的教师，不曾参加印共组织，却遭囚禁长达11年。他本人也被苏哈多政权以“政治犯”罪名关押了9年。他表示这份文件揭露了真相，而英国多年来一直否认参与颠覆苏加诺的政变。“我强烈要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在大屠杀事件中获利的国家，应当向苏加诺的忠实追随者及无辜死者负责并作出道歉。”就如荷兰威廉国王于2020年向印尼致歉一样。“作为受害者，我们很愤怒，重建(Rekonsiliasi)不可能没有真相，希望所有真相能公开。”

香港《南华早报》(SCMP)报道，对英国涉及印尼1965-1966年大屠杀事件的怀疑由来已久，这份最新文

件显示，英国官员在上世纪60年代秘密使用“黑色宣传”手段，鼓动一些印尼知名人士“切除共产主义癌症”，秘密煽动印尼右翼分子消灭印共及左翼人士。

英国精心策划反共宣传，煽动印尼军方推翻国父苏加诺及“铲除共产党”，是1965至1966年印尼大屠杀的幕后黑手之一。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同样在大屠杀期间煽风点火。印尼特赦组织的乌斯曼(Usman Hamid)表示，有了新证据，政府不能再以历史久远、缺乏证据为由推托重启对大屠杀事件的调查。不过，他却没有对西方作出有力的抨击。

《今日俄罗斯》(RT)分析，1963年，印尼和当时英国殖民政府马来联邦之间严重对抗，令英国不满。印尼军方和印共是当时支持总统苏加诺的两支关键力量，苏加诺一直在两方之间努力取得平衡，这给英国发动反共宣传战、搞垮苏加诺政权提供难得的机会。

熟悉这段历史的记者邓肯·坎贝尔称，英方当时能截获印尼的信息，掌握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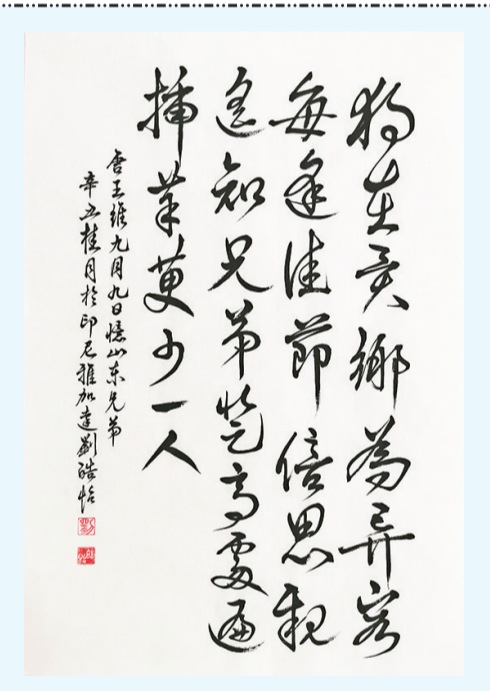
尼军政屠杀左翼的动向。时任英外交调查部(IRI)的专家诺曼·雷达威曾向英驻印尼大使透露，英方政策是掩盖印尼军方鼓动屠杀的事实，苏加诺倒台是英国宣传战的重大胜利。并吹嘘：“苏加诺跟马来联邦搞对抗导致英国每年花费2.5亿英镑，但宣传战在6个月内只花费极低的成本就把问题解决了。”2017年美国解密文件显示，美方也怂恿大屠杀的进行。

美国将反西方殖民且亲共的苏加诺政府视为眼中钉，中情局(CIA)曾于1958年在印尼资助地方武装叛乱。当时持反共立场的印尼军队，大多曾接受美军的训练和影响。

英国的罪行引发热议，网友JOAQUIN表示：“不仅是针对共产党人，任何和英国规则对着干

的人都面临着一样的命运：大屠杀、饥饿、掠夺等等。这些英国人的衣橱里藏着数百万人的尸体。”ONCOM网友直言，“在每个骚乱事件背后，总会有西方的干涉。”

回顾历史，西方因担心葡属东帝汶倒向苏联，极力鼓动印尼出兵。但苏联解体后，西方又以民主为由支持东帝汶脱离印尼统治。善恶果报，天道好还，且看英国如何收场？



刘皓怡书法作品 [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陈添贵

早期的实践者

随着技术的发展，留声机和黑胶唱片逐渐成为20世纪初居住在荷属东印度的欧洲人急切寻求的商品。看到这一商机，华人开始成为售卖这些商品的代理商。从那时起，用小提琴或者钢琴演奏西方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所带来的动人旋律，对居住在城市中的华人家庭来说愈加熟悉，这其中就包括了日惹的印刷企业家陈月明(Tan Gwai Bing)。

陈月明常去他哥哥售卖黑胶唱片的店里听歌。正是从那里，他开始了解著名作曲家所创作的小夜曲、华尔兹以及军队进行曲等。当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后来他许愿，如果之后能够有一个儿子，他

会把小提琴作为礼物送给他(Surtihadi, 2008:62-63)。1913年7月8日，他的第二个孩子在日惹出生，是个男孩，取名为陈添贵(Tan Thiam Kwie)。

陈添贵在类似小学的荷兰中华学校(Hollands Chinese School, 简称HCS)就读时上了第一堂小提琴课，恰好在那里有一位教小提琴的印尼土生华人老师陈敬然(Tan King Djan)。后来，当他在类似初中的初级中学(Meer Uitgebreid Lager Onderwijs, 简称MULO)和类似高中的高级中学(Algemeene Middelbare School, 简称AMS)就读时，他师从日惹欧洲俱乐部管弦乐队(Sositet)中的两位小提琴家——来自菲律宾的弗朗西斯科·贝纳多(Francesco Bernardo)和来自意大利的阿蒂利奥·格诺基(Atilio Gnocchi)。也是在那个时候，陈添贵结识了著名小提琴家苏万迪(Soewandi)，他们后来还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从苏万迪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小提琴的知识。苏万迪的孩子们后来也成为著名的音乐家——其中一位还与诗人连德拉(W. S.Rendra)结婚。

古典音乐(2)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随着外语能力不断提高，陈添贵开始从荷兰语、德语和英语的小提琴练习教科书中获得更多知识。1933年，他成为了一位小提琴家，同时也和管弦乐队社团维雷尼根(Orkes De Vereeniging)合作。20世纪30年代，在这个管弦乐队社团的一个项目中，只记载了三位非欧洲籍乐手，他们分别是：苏万迪、马斯·萨尔迪(Mas Sardi) [小提琴家伊德里斯·萨尔迪(Idris Sardi)的父亲]和陈添贵(Surtihadi, 2008: 62-65, 79)。

进入独立时期，陈添贵以小提琴手的身份与苏万迪(Soewandi)为首的日惹电台管弦乐队(Orkes Radio Yogyakarta, 简称O.R.Y)合作，一直到他退休(1946-1981)。看来在那个时候，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已经开始考虑民众对于音乐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校的需求。这个初步设想由穆罕默德·雅明(Muhammad Yamin)、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 Buwono IX)、苏帕尔迪·伯拉维罗诺尼格罗(Supardi Prawironegoro)和包括陈添贵在内的其他几位人士共同提出，于1952年在日惹成立了印尼音乐学院(Sekolah Musik Indonesia, 简称S MIND) (Surtihadi, 2008: 83-84; Hardjana, 2004: 319)。自1952年6月至1965年3月，陈添贵一直在该校任教。后来，他又参与了印尼音乐学院(Akademi Musik Indonesia, 简称AMI)的筹备建立工作，并于1964年4月到1965年3月期间在该校任教(Surtihadi, 2008: 84-85)。

这两所音乐学院至今一直沿用西方古典音乐教学方法系统培养音乐储备人才。印尼音乐学院(SMIND)后来成为卡西罕国立第二职业学院(SMK Negeri 2 Kasihan) [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称为音乐中学(Sekolah Menengah Musik, 简称SMM)]，印尼音乐学院(AMI)后来成为日惹印尼艺术学院(ISI)艺术表演学院音乐系的音乐艺术学

科。

陈添贵后来改名为卡尔纳吉·克列斯丹多(Karnadji Krestanto)。为师多年的他已是桃李满门，其中一位学生就是1949年出生于日惹的爱可/林爱莉(Ayke Liem Ay Lie) [现在多被称为爱可·阿古斯(Ayke Agus)]，她是一位具有国际水准的小提琴家和钢琴演奏家。爱可(Ayke)作为20世纪的传奇小提琴家贾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的学生而闻名，后来一直跟随着海菲兹。时至今日，居住在美国的林爱可仍然活跃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教学领域(Agus, 2001: 78-79, 82; http://www.aykeagus.com/Biography.html)。

1959年在梭罗(Surakarta)出生的鲁鲁克·布尔万多(Luluk Purwanto)是一位国际爵士乐小提琴家，他也是陈添贵的学生(Stokes, 2008: 209)。1985年，布尔万多以巴斯卡拉(Bhaskara)爵士乐团小提琴手的身份，第一次代表印尼出席在荷兰举行的著名的爵士乐表演盛会——北海爵士音乐节而闻名。直到现在，布尔万多仍然在国际爵士乐坛奋斗(见www.luluk.com)。为了表彰

陈添贵在文化艺术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日惹特别行政区政府1984年授予陈添贵艺术奖(Anugerah Penghargaan Seni)中的“西方音乐的建造者”荣誉称号(Surtihadi, 2008: 94)。1992年陈添贵逝世，安葬在位于日惹班图尔(Bantul)依莫里吉(Imorigi)的吉利萨普多艺术家墓园(Pemakaman Seniman Giri Saptu)内，他的音乐家朋友们，像库斯比尼(Kusbini)、曼尼克(L.Manik)和锡亚吉安(M.P.Siagian)也长眠于此(Surtihadi, 2008:98)。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林爱可与雅加达首长阿里萨迪京